

丹麦影像

沈坚

北方的云啊北方的风,总也带着些萧瑟而孤独意味。即便是仲夏的北欧,也还透出种种潜沉的凉意,比不得地中海那边清晰可感的干呼呼的撒哈拉热度。丹麦尽管算得北欧诸国地理位置最为偏南的一员,却仍极易触及她冷冷的额角。七八年前,我的北欧之行的最后一站,便是行走丹麦,由挪威乘邮轮跨海行驶了一整夜,次日上午才抵达的。

傍晚从奥斯陆启航时,港内尚大雨滂沱,及至晨起,便已天清气朗,阳光明媚。船只穿越丹麦诸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间狭长的卡特加特海峡,过厄勒海峡处最窄,仅4公里,左舷可远眺东边瑞典海岸的赫尔辛堡,西边则为丹麦沿海的赫尔辛格,是两国间相距最近的两座小城,海峡中还有阻塞其间的萨尔特霍尔姆岛。邮轮行抵哥本哈根港后,为抓紧时间,我们一行随即乘汽车掉头返赫尔辛格,去看那里的世界文化遗产克伦堡堡。

现今所见的克伦堡,始建于1420年前后。被火焚毁后,由丹麦和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重建。1658年,该处遭瑞典军队侵占,所藏财宝被掠夺一空,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再度恢复。城堡上的加农炮是依据17世纪签订的军事协定架设的,以往可控扼厄勒海峡水道,而今只在王室举办重大庆典时才会鸣炮致意。克伦堡的名气响,不光在其建筑技艺的精湛和代表性,尤其在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色方面,据说此处就是英国莎士比亚名剧《哈姆雷特》故事发生的地方。我注意到,城墙一隅镶嵌有一方莎翁人像的石浮雕。这些天在城堡挂出来的戏剧广告,迎风招展,分明标示着就是纪念哈姆雷特国际戏剧节的。欧洲城市每年夏季举办各种戏剧节、音乐节,内容丰富多彩,洋溢着满满的引人入胜的文化氛围,克伦堡只是其中之一。

在赫尔辛格城内,还观看了圣玛利亚教堂。这是躲过宗教改革浪潮而残留下来、为数不多的北欧天主教堂。大多数北欧教堂皆因宗教改革的影响而变为新教教堂,天主教的势力反而存之不多。圣玛利亚教堂外墙以红砖砌筑,带有凸显的哥特式尖顶。这一日大概是丹麦青年的成人节,中学毕业生们身穿白衬衣,不论男女皆头戴白顶红沿软帽,举行完演讲仪式后,即登上专门租来的敞篷卡车,举着啤酒欢呼、吹哨、喝彩、放纵,一路呼啸游行,喧腾欢快一整天,似乎要将一切烦恼和压抑统统抛诸脑后。上午在赫尔辛格所见这一幕,不想傍晚在哥本哈根重又见识,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。丹麦年轻人的这一成年节,碰巧让我们遇上了。

下午,我们一行驱车赶往哥本哈根以西的旧都罗斯基勒。十一至十五世纪时她曾是丹麦历代国王的驻地最重要的宗教中心,以罗斯基勒大教堂规模为最。该教堂始建于十二、十三世纪,1464年落成。为丹麦境内首座哥特式教堂,老远就可望见一对尖锐、高耸的塔楼大尖顶,风格上且兼有罗马式特征,是两种风格的杂糅。外墙采用红砖作面,灰黑色砖饰,线条洗练。教堂内摆有绘饰精致的金色木雕祭坛,还包括20位国王、17位王后在内的王室墓葬,诸如女王玛格丽特一世,克里斯蒂安二世、三世、四世等人,还有主教的棺柩。这些随葬的帝王主教都被塑造为安卧的大理石像,洋溢着中世纪的文化气息。整个教堂内庭的设计精巧完美,令人慨叹,难怪被列入丹麦的世界遗产名录之中。

距罗斯基勒大教堂不远的峡湾边,曾在浅水处发现有5艘维京船残骸,完全依古代技术制成。丹麦方面在此考

古发掘遗址的基础上,以发现的龙骨、船板来拼接古船,复原样貌,建成一座维京博物馆。欧洲史上的八至十一世纪又称维京时代,即北欧海盗时代。当时他们驾船四出扩张,喧腾呼啸。这种木船造型别致,适应性强。其船体狭长,系独立单帆船,可艏艉进退。多年前我曾探讨过这一课题,撰有论文,但能实地赴北欧造访、体验,获得生动直观的印象,还是极为难得的。

北欧夏季昼长夜短,从罗斯基勒返哥本哈根,天色尚早。晚餐后,一行便又在市政厅附近漫步。这里有设计大气的市政厅主楼,深棕色砖墙,周边可见王宫宾馆、报社大楼,有安徒生铜像、带牛龙斗法铜像的广场喷泉、古代武士纪念碑,还有哥本哈根市中心零公里标志碑。马路对过则是人们游乐的蒂沃利乐园,不远处又是藏有大量艺术珍品的嘉士伯博物馆。用餐所在街区恰在哥本哈根大学附近,大学的一些学院及圣彼得教堂散布其间,此地也因之成了城市的学术文化中心。说起丹麦,其实不光有名动天下的童话大师安徒生,还有物理学家的哥本哈根,以量子力学著称。丹麦青年第谷等自然科学巨擘。一个仅五百余万人口的小国,能对人类文化有此卓越贡献,难道不惹人羡慕吗!

翌日,我们主要在哥本哈根周边西兰岛转悠,这一带是丹麦人口最集中、经济文化最繁盛的地区。清晨先抵位于西兰岛北端的希勒罗景观,距哥本哈根35公里远,这里以腓特烈堡而闻名。1560年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在此购下城堡,并以其名命名。主建筑称腓特烈斯堡,现为丹麦王室行宫,亦对公众开放。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每年春秋两季会移此居住。腓特烈堡乃一庞大建筑群,还有后花园。虽在园林景观设计上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是竭力效仿凡尔赛模式的,但论原创性、精美度和规模,仍难与之比肩。腓特烈堡的出名,还在于历史上的丹麦海洋霸权之争。1720年北方战争末期,瑞典迫使丹麦停战的和约就是在此签订的。腓特烈堡曾于十九世纪中叶毁于火灾,后由嘉士伯啤酒厂出资修复。加上王室多年收藏的增补,由此形成了国家历史博物馆。原由王室专用的教堂,也已对平民开放。不论教堂还是建筑的装饰都很奢华,被誉为丹麦最美的宫殿建筑,不同于一般新教国家审美的简洁风格。

滨海公园处处有景,也看到了一些后来的历史纪念物,像战争胜利纪念柱、二战英雄石像,用于打击德寇的水雷塑像,与之关联的还有丘吉尔胸像、丹麦国王腓特烈九世的立像。后者的设立,显然与他及其父克里斯蒂安十世不屈不挠的战时表现有关。丹麦尽管国力弱小,横遭纳粹铁蹄践踏,但人民仍组织抵抗运动。时任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拒绝弃国臣服,反对纳粹占领,甚至一度被捕下狱,但他出狱后一如既往地骑着高头大马四处巡视。他的这一形象,已成为当时欧洲抵抗力量传颂的有力象征。由这里,还可望见峡湾对岸现代风范的哥本哈根歌剧院,在这座充满着传统色彩的古城内,居然还串缀着若干现代型的方圆大玻璃建筑地标,颇为开眼。

游览哥本哈根,王宫广场是一定会去的。丹麦王室自1794年迁此,即所谓阿玛琳堡王宫,由4座三层宫室相对合围而成,直接临街,没有深院围墙阻隔。4幢建筑分别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夫妇及其长子次子居住。王宫的活动对民众是公开的,女王在哥本哈根期间则须王宫悬挂,若外出离宫,则下旗。离阿玛琳堡王宫仅百米之遥,便是哥本哈根最引人瞩目的大理石腓特烈教堂,仿罗马圣彼得教堂而建,有一巴洛克风格的巨型穹顶,极为壮观。腓特烈教堂外侧面有安斯伽的铜像,以不忘传教之史,9世纪时就是他,将基督教传入北欧地区,安斯伽便成了斯堪的纳维亚的主保圣人。

哥本哈根(København)地位的上升,同其港口的商业兴盛分不开,其地名本即丹麦语“商人的港口”之意,到了此地,最初的港口也是一定要领略、体验一下的。不宽的运河两侧停泊着不少老船,有木壳的。河岸上为步行街,满目皆是五颜六色的老房子,尽力维持着原貌,有酒吧、餐厅、鱼市、商铺、旅馆及红灯区,商港活跃之状不难想像,如今则多了些私家游艇。新港20号红房子,文物铭牌上注明是安徒生故居,但不对外开放,究属私人产业。港内运河上水光摇曳、帆樯林立的景色,已成长期的保留节目了。

宗月,小羊圈,和傅高义

赵武平

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,王府井迤西路北的北京饭店,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的房客。他胖胖的,走起路来,脚步很重,身子一歪一歪的。他的装束,也跟旁人颇不相同:皮大衣里面套着西装,底下穿的却是两条蓝绸子棉套裤,还扎着裤脚。他一副怪怕冷的样子,似乎不大适应十冬腊月的天气,——冷得好像连空气也冻上了似的。

这位看上去顶特别的来者,不是别人,正是年前才从美国回来的老舍。十二月十一日那天,他上了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,到前门一出站,就看见来接站的楼适夷。他们是抗战时期在武昌认识的老朋友。老舍随他一起来到王府井,在这家法国人早年间造的七层楼高的洋派大饭店住下来。紧接着,他托了老同学,帮忙四处看房,想买一个称心的小三合院。

为了凑钱,他还往美国写信,请代理人大卫·劳埃德从纽约寄来版税。他说:“我的家人正在从重庆回来的路上。我得给他们置办个家。如今,北京又成首都了,在这里找一所中意的房子,是既费钱,又麻烦。要是您能寄五百来美元到香港,由侯大夫转给我,我将非常高兴。”(侯宝璋大夫,香港大学病理系,香港。)

也由于参加什么工作还没有一定,除了开会,接待访客,探望亲友,他就窝在房间里,或倚在沙发上看解放区的文艺新书,或将就着伏在装了一面大镜子的梳妆台前奋笔疾书。

他以客舍为家,在饭店二楼的二二二二房,一住就是两个月。

不过,一天到晚,总踱在饭店楼上,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他在美国落下腿病,走路相当吃力。拄着拐杖,顶多勉强地走到饭店大门口,出了门口,就得坐车。他埋怨说:“我真喜欢吃点烧饼果子,可是,出了饭店,走到东单,也就是普通人三十分钟的路程,我就得走上半天,还得歇四五回!”

可是,他今天无论如何,还是得出一趟门。他须上一趟东安市场,到大陆银行去取五万块钱。他一定要赶在年前,去看望宗月师母,给她送上过年钱。明天一过,就是大年初一。

二

这些年来,老舍跑东跑西,到处流浪,没有一定的住所,但北平的至亲故友,始终在他心上。一回北京,——北平两个多月前又改回叫北京了,得知许多亲人都平安,特别是宗月师母也仍健在,他真是既兴奋,又欣慰,还有一些微茫的伤感,——愿人宗月大师坐化以来,一晃就是八年多了。

和老舍一样,宗月也是满人,他乐善好施,扶孤济贫,是西北城人尽皆知的“善人”。出家前,老舍喊他“刘大叔”,——那是在他的名字还是叫庆春的时候。后来,老舍到上学年纪,本该随大自己八岁的兄长,去学徒而不是念书,写得刘大叔伸出援手,才幸运进入私塾,还不用交学费和书钱。

及长,他又听说,两个家族的渊源,还要更为深远:

“他与我们的关系是颇有趣的。虽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帮过忙,我们可并不是他的家奴。他的祖父、父亲,与我的祖父、父亲,总是那么似断似续地有点关系,又没有多大关系。一直到他当了家,这种关系还没有断。”

言外之意,他们是世交,——四辈人的交情,始于曾祖一代。他也记得,老年间的事,老辈们闲话,往往要这样说:

“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。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,已无可考查。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,并给夫人装烟倒茶。在我们家里,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,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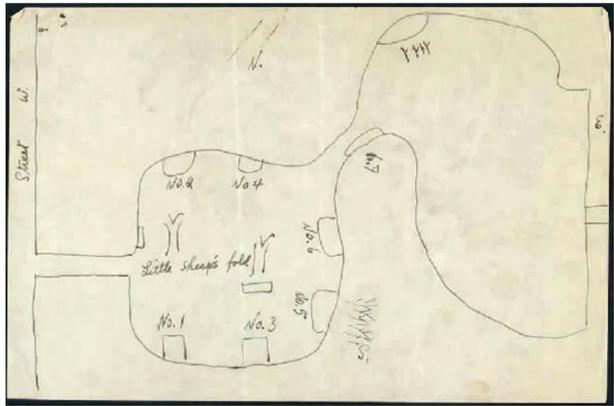
曾祖母的传说,恰也解释了为何他家祖辈隶属正红旗,而到他出生时候,却是住在正黄旗地面。

按说,大清入关建都,老舍先世征战有功,在西直门内旗下营地分到住房。大概没到其曾祖一辈,他家就已败落,“北城外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前人被卖掉,只剩下二亩多,排列着几个坟头儿。旗下分给的住房,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,换了烧鸭子吃”,所以不得不考虑觅房他迁。也是在此前后,朝廷的八旗禁限渐已宽弛,穷困潦倒的旗丁有了迁移的自由。于是,等到外放大员任满回京,随侍的老舍曾祖母就用佃佃所得,在贴近护国寺西墙根的小羊圈买下房子,一家人搬出正红旗防地。

老舍能在小羊圈出生,不能不说,也是仰赖宗月祖上荫庇。

三

小羊圈是老舍的出生地,《四世同



小羊圈地图,老舍1947年亲笔绘制

堂》和他的自传小说《正红旗下》里的事,大多也发生在那里。

老舍投湖自沉后的第十三年,胡絮青和舒乙母子第一次来到小羊圈,亦即现在的小杨家胡同,绘出一幅《小说《四世同堂》小羊圈胡同示意图》。不过,那时可能谁也想不到,老舍在一九四七年的初春,也画过一幅小羊圈的地图。

老舍亲笔画的地图,比其家人所绘更加准确,活脱一幅形象的“葫芦图”,只不过“葫芦”并非坐着,而是平躺着的:“嘴”对着西大街,“屁股”撇向东南。图是在一张A4大小的普通书写纸上,用钢笔勾画而成,上面用英文明白标了“小羊圈”,“大街”,东南西北四个方向,一到七院落分布,以及两棵大树的所在位置。图画得讲究,用笔简繁得当,看去一目了然;拿它比照《四世同堂》里的描绘,简直没有一点儿出入:

“说不上,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小羊圈,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,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,而是颇像一个葫芦。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,很细很长,而且很脏。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,人们若不留心细找,或向邮差打听,便很容易忽略过去。进了葫芦脖子,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,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,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。走了几十步,忽然眼一明,你看见了葫芦的胸:一个东西有四十步,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,中间有两棵大槐树,四围有六七户人家。再往前走,又是一个小巷——葫芦的腰。穿过‘腰’,又是一块空地,比‘胸’大着两三倍,这便是葫芦的肚儿了。‘胸’和‘肚’大概都是羊圈吧?”

老舍写过小羊圈的方位,就手儿交代了祁家房子的由来:“祁家的房便是葫芦胸里。街门朝西,斜对着一棵大槐树。在当初,祁老爷子选购房子的时候,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”。祁老人是四世同堂的老大爷,也就是曾祖父;他们是一家十口同住。而老舍家在小羊圈的房子,由曾祖母置买,前后也正好住过四辈人。

四

天下还有比这再巧的事?

老舍的小羊圈地图,是画给浦爱德,供她作翻译参考用的。我抄录过浦爱德半封信,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的。那一年的夏天,老舍没装骨灰的骨灰盒在八宝山隆重安放。浦爱德闻讯,给戴乃迭写信说:

“一九四六和四七年冬春初,我和他合作翻译《四世同堂》,他把书名用英文译作The Yellow Storm。他每晚七点过来,我们一直工作到十点。之所以时间这么晚,是因为我在援助中国工合的美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,要忙一整天才能收工(幸好我那个时期不用到外地活动)。”

在同一封信里,浦爱德还说:“我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同寻常。老舍用中文朗读,我用英文打出来。他实际掌握的英语,要高于他自己所说的水平。我一边打,一边念给他听。他经常要质疑,也会帮我改正。难缠的地方,我们一起讨论。我记得,他格外喜欢我把‘癞头花子’,译成‘scabby headed beggar’。”

五

浦爱德的信,老舍的小羊圈地图,还有《四世同堂》的译稿,都是七八年前的一个暑假里,我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的。

我那年七月到美国后,一站先到纽黑文,打算在耶鲁大学听一星期课后,再绕道罗德岛,到波士顿近旁的剑桥萨姆纳街十四号傅高义教授寓所,讨论出版他的《日本第一》,接下来上他家西面不远处的施莱辛格图书馆,去查看保存在那里的浦爱德档案。

上一年五月下旬在纽约,满校园披着浅蓝长袍的哥大本科生,兴高采烈地在白色帐篷下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两天,我在巴特勒图书馆的珍本与手稿部,找出一份老舍同浦爱德签订的翻译合同,获悉《四世同堂》的英文译稿,尚完好收藏在哈佛大学;浦爱德一九八五年以九十六岁高龄去世,不少档案文件捐给了施莱辛格图书馆。那是美国第一所妇女研究专业图书馆,得名于哈佛大学著名史学家老阿瑟·迈·施莱辛格教授,——他儿子小施莱辛格是费正清的连襟,也是哈佛历史系教授;它所处的拉德克利夫学院,原是美国有名女校。

那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夏日的午后,晴朗,燥热,还没有一丝风;极高的蓝天上面,浮着很厚的白云,一大朵一大朵的,动也不动。因为是假期,偌大的图书馆里,看不到几个人,二楼明净的大阅览室尤见静谧。近三十盒浦爱德档案——送来之后,我很快从中检出一些老舍所画小羊圈地图,浦爱德的一些通信,和她翻译的《四世同堂》全部文稿。人们一直以为,这部写于七十多年前的长篇巨著,再也没有希望看到全璧: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,老舍把定稿的《饥荒》前十章,寄给上海《小说》月刊发表。连载不及一年,即告无疾而终。又过十五年,腥风血雨的八月下旬的一天,老舍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小院中,呼啦啦地闯入一大帮小将,《饥荒》的未刊手稿,从此不知所之。

那天下午,我从图书馆出来,来到傅高义教授家里,谈过出书的事情,接着讲了档案里的《四世同堂》译稿,和日本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横山永三写的一封信与他有关的信,——横山是青木正儿的弟子,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哈佛作访问学者;老舍的美国经历,是他的研究课题。

横山在信里,一口气向浦爱德提了好些个迄今无人能够全部回答的问题: [1]老舍何时应国务院邀请来美

国?一个人来的吗?如果是,访美期间,他家人在哪里?他独自在美国生活吗?

[2]他来美国有何目的?

[3]他来的时候,是否病得厉害?医治了吗?

[4]他在美国住在哪里?

[5]他据说在纽约,写过一部长篇。如果属实,写的什么?何时动笔,何时写完?写别的东西了吗?

[6]他在写作以外,还做了什么?

[7]他对于这年的生活有何感受?

[8]他何时离开美国?

[9]他为何回红色中国,而不是去台湾?如果他没说过,您觉得,他的理由是什么?

[10]他回红色中国,国务院作何评价?

横山也在信里说,因为没有老舍的资料,就通过傅高义教授,联系上了费慰梅。她当年在重庆美国大使馆,任文化关系官员;老舍和曹禺赴美访问,即由她具体安排。但由于美国国务院档案的缺损,她并不能提供更多信息,但向他推荐了浦爱德。

“是这样吗?”傅高义先生笑着说,“他来哈佛,我有印象,但这封信,我不知道。”

后来,我把横山的信复制了,送到傅高义先生手上,——在老舍研究的道路上,他是横山至为重要的引路人。他其时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。

四十多年后,傅高义先生又在同一条道路上,以引路人的身份,在我的面前出现;四年前的八月间,我能进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工作,也是受惠于他的无私帮助。

六

在哈佛那一年,我们同傅高义先生住得很近,只是一街之隔。

我们住的房子,门牌是欧文街一百〇九号,位于紧挨着神学院的一个路口的西南角,隔一条不宽的小马路,北面正对的黄色小楼,是常有三三两两中国学生出入的东亚系的办公室;斜对面的东北角有一大片参天大树,密林深处隐藏着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房子。

傅高义先生也认识我们的房东安德鲁,和他的母亲玛丽安。老太太是小阿瑟·迈·施莱辛格教授的遗孀,她姐姐就是费慰梅,两人都出身于拉德克利夫。

第一次见到玛丽安,说起我正在研究的老舍,一百〇四岁的她耳误视听,兴奋地大喊起来:

“老舍?!你也认识老舍吗,我认识他啊!”

八十二年前的夏天,二十三岁的玛丽安一出校门,就孤身一人搭乘邮轮,从旧金山经上海到北平,去看费正清和费慰梅,因而也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,以及金岳霖,也成为来往密切的朋友。这些年,每说起傅高义先生,想到他给予我的研究,和我们一家的关照,他那笑眯眯的模样,就在我的脑际浮现,——这个时候,老舍追念宗月大师而说的话,仿佛也在我的耳畔响起:“没有他,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书读书。没有他,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。”

老舍的话,尤其后面一句,也是此刻回想傅高义先生,我心里最想说的,——不能相信,他离开我们,竟已整整一年;而害人三年的瘟君,依然一点儿也不肯消停。

二〇二二年元旦,凌晨一点半,打浦桥



庭院松风夏蝉鸣(版画) 林茂鑫



“文汇报” 微信公众号